

先秦汉唐

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付开镜◎著



人民出版社



先秦汉唐 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付开镜◎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邵永忠 王建虹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汉唐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付开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01-016403-8

I. ①先… II. ①付…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7537 号

先秦汉唐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XIANQIN HANTANG CHUANTONG ZHENGZHI WENHUA YANJIU

付开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16403-8 定价: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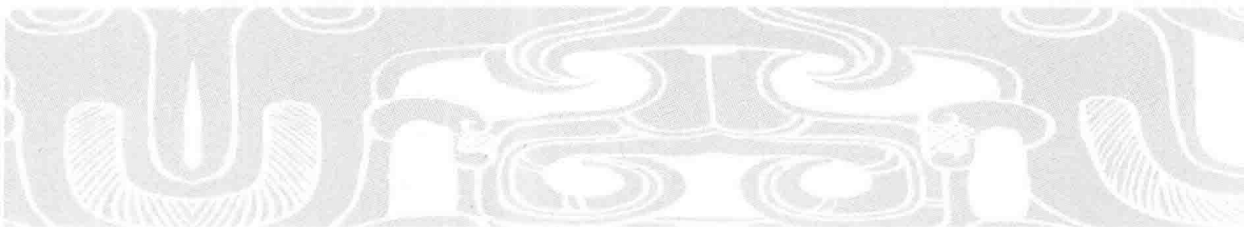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许昌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系列学术成果



绪 言

本书分为9章即9个专题，每个专题均从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形成多角度的认识。

第一章主要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孔子建立了学习榜样和批判典型的系统以进行教育传播。孔子树立榜样的理论基础是仁，树立的榜样具有多样性，可满足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需求。同时孔子也树立了供人批判的典型以进行警示教育。孔子树立榜样和批判典型的教育传播方法，使其教育思想充满了人民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强化了教育的现实性和生动性。

其二，孔孟的政治思想，代表了全社会所有阶层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孔孟政治思想的最高宗旨，是取得社会全体国民的共赢。因此，孔孟的儒家学说，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关注与接受，并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三，儒家顺应民意思想的根据在于民意与天意的一致；不重民意，政权就要为民所弃；顺应民意方能得到民众支持。顺应民意的方针有以民为本、富民、与民同乐、为民父母、尊贤使能、均平等。儒家教化民众思想的根据在于儒家的性善论，但人性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劣变。儒家还认为社会上人的智力不同，大量的人都需要经过学习即教化方可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教化民众的方针有先富后教、先正己后正人、德主刑辅、有教无类、任贤使能、仁礼教化等。教化的目标是让人都成为“仁人”。儒家顺应民意思想承认了民意的合理性，否定了统治者意志凌驾于民意之上，使儒

家思想成为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学说。儒家教化民众思想开启了一条正确的治理人民的道路，并可为国家提供后备人才。顺应民意是教化民众的前提，教化民众是顺应民意的补充与提高。

其四，中国古代在治水过程中产生了国家。大禹的治水之“治”展示了中国最早国家领导者智慧的伟大与民众力量的强大。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是“治”之意义的一次质的飞跃，飞跃的根源在于统治者认识到水“润下”及“平”之特性并用于治国。“君舟民水”理念的形成，是治水之“治”含义的进一步升华。

第二章主要对儒家的爱情观即孔子的爱情观及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进行了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经过孔子整理的《诗经》中情诗占有一定的分量，由此可臆想孔子的爱情观。其中《关雎》中的君子，当是孔子的化身，而《关雎》中的淑女，当是孔子理想的女性。《诗经》中的情诗，都是孔子爱情观的体现。爱情观的教育是孔子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中国古代存在严重的崇母贱妻现象。崇母贱妻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因此，中国古代女人的地位有一个变动的过程，作为妻子地位较为卑下，作为母亲，地位却相当高贵。不加区别地认为中国古代女性一直受到男性的压迫，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符合。

其三，中国古代妇女的参政，存在显性参政与隐性参政两种。隐性参政的人数多于显性参政者。隐性参政方式有三：一是以官员母亲的身份对官员的政治行为进行指导、建议或干预；二是以妻妾的身份对官员的政治行为进行建议或干预；三是以亲属的身份对官员的政治行为进行劝导。古代妇女能够隐性参政的原因有三：一是受儒家母子血亲关系的影响；二是受夫妻伦理关系的影响；三是受亲属关系的影响。中国古代妇女隐性参政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起到了规劝官员崇尚正义、清廉为政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起到了怂恿官员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的作用。

第三章主要对中国古代的“儒家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两汉时期，中国北方胡人的性观念还处于非儒家化时期。魏晋

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性观念进入儒家化阶段。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是鲜卑民族汉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大提升了鲜卑民族的文化素养和伦理观念，标志着南迁中州鲜卑民族性观念儒家化的基本完成。而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两朝皇室中出现了严重的乱伦现象，又呈现出“胡化”趋势。这既与他们文化的“胡化”有关，又与他们的特殊身份有关，并未影响鲜卑民族性观念儒家化的总体走向。

其二，先秦到两汉时期，人们养犬以经济目的为主，对家犬行为的记述，还缺少伦理色彩。到了魏晋南北朝，无论官方史书还是私家撰述，对家犬行为的记述都出现了强烈的儒家化特征。其记述的主要内容有：犬恋其主、犬救其主、犬知其主之危极力救助、犬懂其主之意而为主实现之、犬助人除害、犬之感恩等，对家犬行为记述儒家化的原因有四：一是人类对家犬认识的加深，二是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三是乱世间人际关系的紧张，四是佛教的影响。这些儒家化的记述突出了犬与人之间的道德价值，拓展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诠释范围，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感召力。

第四章主要对中国古代的人才及用人进行了研究，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中国古代各朝都有被称为“万人敌”的猛将。“万人敌”的人生多以悲剧告终，只有少数的结局比较美满。“万人敌”人生悲剧的原因多源于他们性格的缺陷或人格的缺陷。而其人生美满的结局多源于他们个人修养的完善。

其二，中国古代人才资敌现象突出，原因复杂。人才资敌强化了敌国，弱化了本国，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利益。中国当代人才外流与中国古代人才资敌虽然有别，但也有相似之处，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因此，中国古代人才资敌现象给今天的最大启示是：必须做好用人制度的改革工作，以留住人才和吸引海外人才。

其三，中国古代人主用人大体存在明主用贤才、庸主用庸才、变昏明主用奸才三种模式，君主专制制度的天然缺陷决定了三种模式在中国古代循环无已。人主三种用人模式对我国当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确定谁是“明主”，为识才、用才、凝才的关键；完善选举“明主”制

度，堵塞庸才、奸才占据“明主”之位的通道，已成为用人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监察制度，是保证“明主”不能质变为“昏主”的关键。

其四，寒人出身的刘备，与曹操、孙氏兄弟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刘备的用人方式因此与曹操有很大不同，而与孙氏兄弟只有某些相似之处。刘备在无任何政治优势的条件下，借异姓兄弟而莫建功立业之初步根基，借信义而得人才与普通民众的普遍拥护，借真诚求才之心而得天下奇才之感戴。刘备的人格魅力使他网罗了一批忠贞不渝之士，但也因过分重用最先结交的关羽而铸成大错。

第五章主要对中国古代人才的悲剧性行为进行了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在中国古代，高官自污成为政治领域极为突出的现象。自污是为了消解君王的猜忌而躲避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以保全自己和家族。自污是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一大怪胎，严重毒化了政治风气，成为中国专制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难解之题。

其二，中国古代帝王猜忌臣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最高权力的私有化。中国古代帝王猜忌下官员的避祸方式大约有 10 种，即逃隐、自污、贪财、酒色、外镇、屏退、舍亲、愚子、韬晦、投入太子集团、反抗和逃亡。中国古代帝王猜忌臣子造成了人才的浪费、社会的动乱与人民的死亡、国力的削弱与敌国的得益，并恶化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环境。

其三，南朝宋齐皇帝为巩固皇权，预设一些重要异姓武将存在谋反等重罪，而迅速捕杀之。屠杀之后，方开出谋反证据，以证明其惩治的合理性。是为南朝宋齐皇帝的“预制重罪”政策。“预制重罪”政策的首创者为南朝刘宋文帝，其重要表现是诛杀名将檀道济父子及道济手下勇将薛彤、高进之等人。刘宋以后继立的皇帝继承了这项政策。南齐建立后，齐武帝延续了刘宋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其重要表现是处死名将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此后的皇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预制重罪”一方面削弱了刘宋、南齐对抗北魏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之力，加速了本朝的灭

亡。梁武帝开国之后，放弃了这一错误政策，从而在与北魏作战中获得两次前所未有的大胜。

第六章主要对秦汉之际反秦人才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秦朝统一六国后，未在全国实行有效的用人制度，导致社会大批人才前途无望而难以富贵，这些人才对秦朝没有好感，也不认同秦的政权。这些人才主要分为三类：平民型人才、秦朝小吏型人才、六国贵族后裔型人才。这三类人才领导了秦末的灭秦战争，成为灭亡秦朝的中坚力量。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汉朝新政府中的骨干，最终实现了富贵的理想。因此，不能广泛吸纳社会人才是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

其二，项羽的仇秦与刘邦的抚秦，缘于两人出身的不同、家族际遇的不同以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不同、政治理想的不同，并因此决定了两人对秦人的行为态度——即灭秦战略的不同。当然，仇秦与抚秦，带给二人的政治影响也存在巨大的区别——刘邦最终走向成功，而项羽最终走向失败。

其三，秦兵屠杀六国军民导致六国人民产生强烈复仇心理，“秦为无道”“天下苦秦久矣”使六国人民对秦产生了严重的痛恨，秦的本土居民与六国居民也产生了矛盾。是为六国人民仇秦的三大原因。刘邦采取消弭六国仇秦方略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灭秦，必须讲究策略；二是秦人也苦于秦法，他们的心中反感秦的暴政。刘邦消弭六国仇秦的措施主要有：纳降、封府库不受财物、强调秦人与秦法的区别、反对章邯等三人称王、定都关中平等对待天下人民。刘邦消弭六国仇秦方略从心理上取得了秦人的支持，减少了灭秦阻力，并在统一天下之后形成了天下各地人人平等的观念。

第七章主要对我国古代官民的良性互动进行了研究，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中国古代地方官员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农民，他们与农民互爱是政治管理的高度和谐状态。中国古代地方官员与农民的互爱体系，包括官爱民与民爱官以及政府对民爱之官的奖励制度三方面，并形成三位一体的

建构。中国古代地方官员与农民互爱体系建构的主动权在官而不在民，地方官员与农民互爱体系的建构，在一定时空内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君主—地方官员—农民“三赢”的效果。

其二，汉代官民互爱的前提是官员爱民。官爱民引起民爱官，再引起政府对民爱之官进行奖励，从而形成了官民互爱的三个环节。汉代官员互爱成为此后朝代效法的示范。

其三，出身不是决定官员良与恶的决定因素：出身富贵照样爱民，出身贫寒照样害民，接受儒家（或道家）思想教育并形成儒家官德人格，是官员爱民的思想动因。学习儒家经典但未接受其思想者为官可能会祸国害民。在害民祸国之官中，从身份上看，外戚与宦官占有相当的比例。从职位上看，位高权重与权力不受限制，是害民祸国的又一重要原因。从制度上看，权力不受控制是另一重要原因。从皇帝方面看，害民祸国官员的频繁出现多源于皇帝的无能昏庸或皇权的滥用。

其四，中国古代多数统治集团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权的私有性。中国古代各朝解决利益分配矛盾的调节方式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两种。此外，异姓禅代的王朝也多会进行利益调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往往造成利益分配向少数民族成员大转移的现象，而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往往会照顾汉族人民的利益分配。彻底否定中国古代多数政权统治集团的人民性，会轻易否定中国多数政权统治集团在一定时期内的进步性，与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不相符。

第八章主要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进行了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以象形字为主的表意汉字在中国古代有利于制造政治谣言进行政治宣传，其方法有三：以同音近音字制造、以文字基本结构制造、以文字字意制造。其目的有五：为称帝或改朝换代制造舆论，为继承皇位制造舆论，为打击敌国制造谣言，为打击潜在威胁人物制造舆论，为诅咒当朝统治者制造谣言。这种舆论宣传的逻辑显然是胡乱的因果关系，但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因此对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二，魏蜀吴三国在建立政权之前，都重视了政权合法性的宣传作用。曹魏的宣传重点在于禅代的合法性即汉祚已尽、天命所在和曹操父子的功绩上，蜀汉的宣传重点在于其汉家天子血缘的合法性和否定曹魏政权合法性上，而孙吴的宣传却在于否定曹魏政权合法性、汉祚已尽和孙权称帝的合法性上。魏蜀吴三国的宣传队伍、宣传手段、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和宣传时效等都有相同和不同之处。

第九章对汉唐盛世及其当代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笔者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汉唐盛世的文治武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辉煌。当代国人的“汉唐盛世情结”，是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伟大复兴的自信历史根基。因此，“汉唐盛世情结”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只是，我们在向历史看齐之时，还要“睁眼看世界”，处理好汉唐形象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后国家形象、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大、汉唐盛世中汉族成就与少数民族成就、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五大关系，把培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与积极西学结合起来，方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其二，汉唐盛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根。目前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中华民族达到“兴”的标准有多个，其中的重要标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的最高标准是中华民族素质的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能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顺利领导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关键。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
第一节 孔子树立的学习榜样和批判典型系统	(1)
第二节 孔孟政治思想的全体国民性	(9)
第三节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与教化民众思想的统一	(17)
第四节 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	(28)
第五节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有限性民主	(35)
第二章 孔子的爱情观与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研究	(45)
第一节 从《诗经》臆想孔子的爱情观	(45)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崇母贱妻现象	(49)
第三节 中国古代妇女的隐性参政	(58)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儒家化”现象研究——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69)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	(6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家犬行为记述的儒家化	(81)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人才及用人研究	(92)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万人敌”	(92)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人才资敌现象	(98)
第三节 中国古代三种君主用人模式及其启示	(105)

第四节 刘备的出身与用人——兼对曹操、孙氏兄弟的出身与用人进行比较	(110)
第五章 中国古代人才的悲剧性行为研究	(119)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高官自污现象	(119)
第二节 帝王猜忌下中国古代官员的避祸之道	(126)
第三节 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	(136)
第六章 秦汉之际的反秦人才研究	(147)
第一节 人才前途无望与秦的灭亡	(147)
第二节 仇秦与抚秦：项羽、刘邦在灭秦战争中的不同策略	(155)
第三节 刘邦消弭六国仇秦浪潮的方略	(164)
第七章 中国古代官民的良性互动研究	(173)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官民互爱体系	(173)
第二节 汉代官民的互爱	(182)
第三节 汉唐爱民之官与害民之官的比较	(188)
第四节 中国古代统治集团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208)
第八章 中国古代的政治宣传研究	(218)
第一节 汉字构造特点与中国古代的政治谣言	(218)
第二节 魏蜀吴建立前的合法性宣传	(228)
第九章 汉唐盛世及其当代影响研究	(235)
第一节 汉唐盛世的特征与国人的“汉唐盛世情结”	(235)
第二节 汉唐盛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准	(243)
参考文献	(251)

第一章 原始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第一节 孔子树立的学习榜样和批判典型系统

一、孔子树立学习榜样和批判典型的理论基础

胡适认为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①。孔子自己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表明孔子重视正面榜样和反面典型的作用，认为学习榜样会产生示范效应，批判典型会产生内省效应。

孔子提出人的修养目标是成为完满的人，即圣人、贤人、君子，“这是儒家孔子创立了儒家修养学的根本标志”^②。孔子树立榜样的人性基础是：“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既然人的本性相近，因环境的影响不同而产生了品性的差别，就说明通过教育人是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的。因此，孔子认为人人都可做到“仁”，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完人的境界。所以孔子在教育上能做到有教无类。

树立榜样，是孔子传播其理论的重要方法。孔子非常重视树立效法的榜样或批评的榜样，旨在让社会能够广泛地践行其理论。孔子树立了正反两种现实的人物，作为学习的榜样和批判的样板。在现实榜样人物之外，孔子为了能够弥补现实榜样人物的不足，又树立了一些非现实的正面榜样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② 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和反面的典型人物，如孔子提出了君子、小人的概念，作为对现实榜样和现实批判典型人物的补充。

二、孔子树立的学习榜样和批判典型

1. 学习榜样

孔子树立的学习榜样，包括天子国君、贤明大臣、礼让贵族、隐逸高人、一般平民以及非现实的君子等。

第一，天子国君。孔子树立的天子、国君榜样人物有尧、舜、禹、汤、文王等。孔子认为尧、舜、禹是少有的有德有能的天子，因为这三人都把天下之位郑重地进行了禅代，传接其位，而且接受者有德有能，能够真心为天下人民服务。《论语》载：

“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

由上可知，孔子的政治理论，树立在这些贤明天子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孔子一边研究三代的贤明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一边又构建起他的政治

理论。孔子的政治理论十分丰富，概而言之，孔子的政治行为标准是“为政以德”；对人民的管理，处处都要用仁爱操作，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儒家讲德治，讲仁政，实际上都是强调当政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示范，来进行领导。”^①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准备去赵简子处谋事，刚要过黄河，听说赵简子杀了两位享有贤名的大夫，就立刻停止过河。

孔子希望天下人都成为理想的道德人。孔子的德治主张，“也不只是道德政治主张，而是着力于社会政治领域解决人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这一重大问题的人性政治主张”。^②因要做到为政以德，就要有富民、教民、利民等政策。孔子要求天子做到为政以德，并指出了可以学习的榜样人物，因此，孔子的天子政治人格理论，有其可行之处。

第二，贤臣。孔子树立的贤臣榜样人物有周公、管仲、子产等人，这是孔子对国家的官员和想要成为官员者所树立的榜样。

孔子最重视周公，周公成为孔子最为赞赏的国家重臣形象。孔子曾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不仅是孔子对西周制度建设的赞赏，而且是孔子对周公作为周天子辅臣伟大贡献的敬佩。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主张，正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来源。孔子因此把周公当作国家辅臣的最高榜样，并多次梦到周公。孔子也把管仲当作人臣的榜样。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管仲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认为人民要先富后教。孔子同样也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因此，孔子把管仲也当作人臣的榜样。孔子也把子产当作学习的榜样。认为子产“惠人也”（《论语·宪问》），

① 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5页。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有君子之道四”（《论语·公冶长》）。及子产卒，孔子流泪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还把殷商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作为榜样，称赞说：“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

第三，礼让隐者。孔子树立的礼让隐者榜样有伯夷、叔齐、泰伯等人。

孔子说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也”（《论语·述而》），“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第四，贤士。孔子树立的贤士有他的学生颜回以及周代的“八士”等。

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论语·公冶长》）“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颜回安于贫穷，追求精神享受是受孔子赞扬的重要原因。因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此外，孔子还说：“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騫。”（《论语·微子》）这些人也是可以学习的榜样。

第五，“仁人”与“君子”。孔子树立的抽象榜样是“仁人”和“君子”。孔子曾说过：“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杨伯峻《论语译注》释为“全人”。但是，现实中的榜样人物毕竟有限，十全十美者更少，因此，孔子又树立一个非现实人物榜样——“仁人”和“君子”。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说明“仁人是君子中的精英”。^① 不过，达到“仁人”的人毕竟有限，因此孔子提出了“君子”的概念，“作为人生的模范”。^② 认为“君子是一种模范

① 周山：《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